

欧盟对土耳其民主化的影响

[土耳其] 楚哈尔·耶西尔尤尔特·居恩迪茨

【内容提要】 土耳其是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民主和专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多年来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土耳其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改革。欧盟对土耳其提出了严格的或者说是近乎苛刻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土耳其清除军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治化,这包括尊重人权、言论自由、取消死刑、严禁虐待和酷刑等许多方面。土耳其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距离欧盟的标准越来越近,而且还在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尽管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最终能否加入欧盟,还是取决于土耳其自己。

【关键词】 土耳其;欧盟;民主化;影响

【作者简介】 楚哈尔·耶西尔尤尔特·居恩迪茨(Zuhal Yesilyurt Gündüz),土耳其安卡拉巴斯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5)03-0056-07

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努力成为欧盟的成员国。欧盟通过对申请入盟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施加影响,推动它们在民主化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取得进步。直到现在,土耳其的愿望仍没有实现,而欧共体以及后来的欧盟总是要求土耳其注意它在人权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这已成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重要条件。土耳其在法治国家的建设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土耳其在废除死刑、取消酷刑、降低国家绝对权威、重新定义国家原则、限制军事功能和影响以及与欧盟刑法相适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步。所有这些进步都反映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真诚愿望,同时也是土耳其对所受批评的积极回应。至少土耳其是在有意识地体现自己的欧洲价值,并且通过国家层面上的努力,实现其新的所谓加入欧盟的一揽子改革计划。欧盟本身也没有忽视土耳其的努力。

政治标准

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 237 条的规定,任

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该组织。希腊和土耳其都在 1959 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丹麦、英国和爱尔兰于 1961 年申请加入,挪威于 1962 年申请加入。这些申请对于当时还很年轻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一个挑战,它必须在政治标准和法律基础方面对申请加入的条件和范围进行重新确定。^①

1962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比克尔巴赫报告(Birkelbach-Bericht)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加入欧共体的标准:“一个国家,如果其政府缺乏民主的合法性,它的人民不能直接地或者自由地选举代表分享决定政府的权利,则这个国家不能申请加入,在此条件下申请国将不被批准。”这项标准明确体现了欧洲在民主、法治国家和人权方面的价值观。

1973 年 12 月 14 日在哥本哈根通过的《欧洲同一性文件》(Dokument über die Europäische Identität)强调,欧洲的统一性将通过民主和尊重人权来加以确定,

^① Marianne Kneuer, „Die Erweiterungspolitik Europas als Politisches Ziel,“ in *Die Politische Meinung* 413/2004, S.26.

并且“欧洲的统一进程……向具有民主和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为追求目标的其他欧洲申请国开放着”。^[1]

1986年2月的欧洲一体化文件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特别要把民主、选举自由和人权作为一项义务加入进去,从而为……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992年欧洲理事会在里斯本宣布:欧共体对任何欧洲的、民主的国家开放,但是它应该是一个尊重人权并且实行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国家。

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欧洲共同体(EC)发展成为欧洲联盟(EU),该条约的第二项条款声明,“发展和加强民主与法治国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欧盟的一项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1993年6月,欧盟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提出了针对申请加入欧盟国家的具体标准,这些标准包括:(1)实现国家稳定,并以此作为维护民主和法律秩序的基础,在选举方面保障人权,保护少数民族;(2)坚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在联盟内部继续发挥市场的力量和竞争的作用;(3)承担成员国相应的义务,坚持政治联盟和货币联盟所确定的目标。^[2]

上述内容在1997年的欧盟卢森堡峰会上被确定为对入盟候选国进行评估的标准,欧盟的专门委员会还在当年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对入盟申请国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说明。这份报告同时也是欧盟理事会关于入盟候选国所取得进步的全部决议基础。^[3]

以上发展情况表明,欧盟开始把民主化和民主作为一项加入欧盟的严格的条件。

土耳其政治体制的特点

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土耳其做了巨大的努力来实现民主化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与以前相比,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个更民主、更加法治化的国家,但是它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土耳其的民主不仅产生于欧洲的文化史和思想史,而且首先就是坦齐马特时代(Tanzimat - Periode)的产物。^[4]国家推动的民主被视为众多现代化目标中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国家和国家利益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于1923年10月9日)继承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结构模式,并且

使这种模式进一步得到发展。^[5]“奥斯曼帝国的极权国家因素与受到约束的凯末尔主义(Kemalism)的专制独裁混合在一起”,^[6]从而使土耳其的国家民主在形式和结构上(例如多党制、自由选举)要比内容上(例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发展得更好一些,这些都来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和宣言。这最终使得大多数土耳其人对当前的国家体制习以为常,这种国家体制成为一种维护社会团结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把西方和东方割裂了。面对东西方日益升级的冲突和对抗,土耳其人放弃了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预先确立的中立原则,在制度上投向了西方。1946年土耳其开始实行多党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土耳其向民主化道路的转向部分是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从更本质的方面来说,这种转向是因为土耳其从1980年以来受到欧洲社会对国家民主的深刻影响。

在这些转向中,最大的特点是军队荣誉和角色的积极转变。^[7]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军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军队有可能决定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共和国的成立,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就来自军队。当时军队被视为国家的“守护者”(Behüter)和掌握政治命运的关键。^[8]土耳其民主发展的历史经常被军队打断。对西方民主的陌生来源于本民族的信

[1] Marianne Kneuer, „Die Erweiterungspolitik Europas als Politisches Ziel,“ S.27.

[2] 参见 Dokumentation in Europa - Archiv, 13 - 14/1994, S.D.257ff, hier S.D.264.

[3] 参见 Bulletin der EU 12 - 1997, Ziffer 1.5 Punkt 29

[4] 这一时期,土耳其在国家结构和法制建设方面开始了内容广泛的立法活动和受到欧洲影响的政治改革。

[5] 参见 Metin Heper, „Türkisch Democracy Reconsidered: Illusion Breeding Disillusion?“ in Heiko Körner/Rasul Shams(Hrsg.),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urkey in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amburg, 1990, S.22ff.

[6] Zitat Heinz Kramer, „Politische Voraussetzungen eines EG - Beitritts der Türkei,“ in Konrad - Adenauer - Stiftung (ders.),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Voraussetzungen eines EG - Beitritts der Türkei, Sankt Augustin, 1989, S.7.

[7] 对此参见:Wulf Schönbohm, „Zur politischen Situation und Entwicklung in der Türkei,“ in KAS - Auslandsinformationen 8/97, S.67.

[8] Economist, 1991, S.4, Zitat John Redmond, The Next Mediterranea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urkey, Cyprus and Malta, Dartmouth, 1992, S.43

仰,这种情况将会改变,在西方的干涉下,土耳其将放弃以前的信仰。

1980 年的军事干涉和欧共体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了一种类似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面,有 5 000 多人因此而丧命。军事干涉最终在 1980 年 9 月 12 日清晨发生。欧共体严厉地批评了土耳其的局势,不仅采取了外交方式,而且使用经济手段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以使其循规蹈矩地回到民主的道路上来。这些措施对土耳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形势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出于欧共体成员国的愿望。^①

但是欧共体国家与所有西方舆论导向都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1980 年 9 月 15 日,欧共体的外交官员决定与土耳其进行合作,以敦促其尽快回到民主化的道路上来并尊重人权。

作为军事干涉的一种手段,土耳其解散了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员被驱逐出议会,欧共体放弃了与土耳其议会的会晤。1981 年 4 月 10 日,欧洲议会斥责了这种“持续瘫痪的民主”,并威胁说:“如果在两个月内不能迅速恢复这种刻不容缓的民主机制和实践,那么与土耳其的合作将立刻中止。”^②

与此同时,虽然欧共体国家对土耳其的批评越来越多,但是又尽可能地同土耳其保持联系,甚至是合作,从而继续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以促使它重新回到民主化的道路上来。^③

从 1981 年秋天开始,欧共体对土耳其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因为在土耳其国内,军事机构已经占到了优先地位。根据 1981 年 10 月 15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一些政治性党派被解散,部分老政治家被排挤出去,^④有一些人甚至被逮捕。在一次协商性的会议上,与会者起草了一份新的宪法,但是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竞选。因此,无论是政治上激进行为的同情者,还是右翼或左翼大党的成员,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合作者。为此,欧共体委员会做出决定,作为对土耳其国内形势的回应,欧共体决定不再执行联合委员会于 1981 年 6 月 19 日预先确定的第四份财政议定书,^⑤但是部长委员会继续工作。^⑥欧共体不能、也不允许向一个民主程度不符合标准的国家提供

经济援助。财政议定书如果没有各成员国的官方决定则不能付诸实行,因此,从 1981 年 10 月开始,欧共体对土耳其进行经济援助的第三份财政议定书就已经逐渐开始冻结了。^⑦1982 年 1 月 22 日,欧洲议会取消了与土耳其议会的联合会议,并要求废除第四份财政议定书。因此欧共体与土耳其的合作条约也被废除了。^⑧欧共体的这一举措显示,试图将土耳其重新拉回民主化道路的外交努力失败了,它现在又开始使用经济手段,对土耳其以军事方式破坏民主的行为进行惩罚。

1982 年 1 月 12 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向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介绍了新宪法草案和重返民主道路的一些方案和措施。这显示了欧共体对土耳其的意义:一个非成员国的外长努力使他自己国家的内部事务得到欧共体的认可和接受。除此之外,土耳其承诺在 2 月 1 日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共和人民党 (Republikanische Volkspartei) 主席比伦特·埃凯维特 (Bülent Ecevit),以此来进一步满足欧共体的要求。^⑨

1982 年 7 月 1 日,丹麦、法国、荷兰、挪威和瑞典针对土耳其国内仍然严重的混乱局面在欧洲人权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性谴责。^⑩由于使用了军事干涉,土耳其以前没有认真面对它在民主和经济等方面的缺陷,此外,它还要正确处理与希腊的冲突,否则土耳其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明显处于孤立的地位。欧共体对土耳其的要求不会被误解——它必须重新回到民主的道路上来。土耳其军人政府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它与欧共体的合作关系因而就无法继续向前推进。对于欧共

① Meltem Müftüleri Bac, 2001, S.135.

② 参见 ABl. der EG C101 vom 4.5.1981.

③ 参见 Heinz Kramer, *Die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 und die Türkei, Entwicklung, 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einer Schwierigen Partnerschaft*, Baden - Baden, 1988, S.88.

④ 参见 Ahment Evin, „Communitarian Structures, Values and Cultural Behaviour in Turkey,“ in Ahment Evin/Geoffrey Denton (Hrsg.),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Opladen, 1990, S.10f.

⑤ 参见 Agence Europe, 4. - 6.6.1981, S.7 und Agence Europe, 22 - 23.6.1981, S.7. 第四份财政议定书参见 *Bulletin der EG* 6 - 1981, Ziffer 2.2.49.

⑥ 参见 Agence Europe, 22.10.1981, S.11 f. und 29.10.1981, S.8.

⑦ 参见 Heinz Kramer, 1988, S.94.

⑧ 参见 ABl. Der EG C40 vom 15.12.1982.

⑨ Meltem Müftüleri Bac, 2001, S.137.

⑩ 参见 Heinz Kramer, 1988, S.97f.

体的提醒和批评,土耳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显示自己在努力改善这种局面,并向欧共体的要求逐步接近。

经过全民公决,1982年11月7日土耳其新宪法以91.37%的赞成票被通过。这部新宪法也暴露了它的缺点。欧洲理事会宣布,这部宪法的一些条款没有与《欧洲人权公约》以及欧洲理事会的宪章联系起来。尖锐的批评遇到了土耳其国内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争论涉及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公共生活的非政治化以及在今后10年阻止前议会领导人参与政治生活等。引人注意的是土耳其也在竭力强调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主义。

1983年1月27日,欧洲理事会做出一项决议,决定继续向土耳其施加压力,由于它继续损害人权,因此不允许其参加欧洲理事会。如果土耳其成立了通过自由选举组成的政府,则允许其参加欧洲理事会的部长委员会,以便协调彼此之间的立场和行动。

在欧共体的压力下,土耳其军政府领导人决定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并确定在1983年11月6日举行议会选举。1983年春天,土耳其通过了新的政党法和选举法,相应的结果是将老的政治家完全排挤出去,并且新的政党参加选举必须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最后14个政党中有3个被允许参加了选举。

重新恢复正常

1983年11月6日,土耳其举行了军事干涉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令军政府领导人大为吃惊的是图尔古特·厄察尔(Turgut Özal)领导的祖国党(Mutterlandspartei)获得了选举的胜利。1983年民选政府成立,军事管制结束。这个新政府努力改善同欧共体的关系,促使双边关系正常化。^①西方对土耳其的主要批评仍然是不尊重人权和不尽如人意的民主化。

1985年欧洲议会派出了以理查德·巴尔费(Richard Balfe)为首的欧共体代表团去土耳其考察当时的国内形势,随后向欧共体提交的巴尔费报告(Balfe-Bericht)称:“在土耳其没有民主政府,强烈谴责土耳其践踏人权。应敦促土耳其结束在大城市实行的紧急状态和政治禁令。只要这些要求没有实现,欧共体和土耳其就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除此之外,欧共体还应该向土耳其提出5项要求,即废除死刑;结束大量的法院审理的案件;取消酷刑;允许个人向欧洲人权法

院提起刑事诉讼;扩大言论和表达自由。”1985年10月23日,欧洲议会通过了这些决定。^②

来自欧共体最敏感的批评是对前政治家的排斥。在欧共体的压力下,厄察尔政府终于做出了突破。土耳其在1987年9月6日举行了全民公决,并以此机会废除了所有的政治限制。1987年11月,土耳其举行了预先确定好的选举,借此打消欧共体对土耳其1983年选举的疑虑。^③土耳其的这些做法受到了欧共体的赞扬,并巩固了它的民主化成果。

加入欧共体的申请

1987年4月14日上午,土耳其按照《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237条正式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官方申请。^④短时间内,土耳其在民主化道路上做出了3项重大决策:废除1964年一项针对希腊不动产所有者的歧视性政策;在1987年1月23日通过法律,允许个人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第25条提起申诉(将可以向欧洲理事会提起针对土耳其的国家控诉);^⑤成立专门的议会人权委员会以满足欧共体的要求。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决定在土耳其国内受到普遍欢迎,欧共体则持观望态度。欧共体当时仍在讨论恢复与土耳其的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此对土耳其提出的入盟申请感到非常吃惊。^⑥欧共体当时正在忙于建立内部市场和向南扩大,因此并不认为考虑土耳其的入盟申请是当务之急。

欧共体与土耳其的关系正常化继续向前发展。作为对土耳其政治改革的“褒奖”(Belohnung),1988年9月15日欧洲议会做出决议,重新启动与土耳其的合作进程。^⑦现在土耳其又可以得到积极的经济援助了。1987年11月17日,欧共体做出“土耳其特别行动”(Sonderaktion Türkei)^⑧的决议,向“欧共体-土耳其商务周”(Business week EG-Türkei)提供了最高50万欧

① 参见 Atila Eralp in Canan Balkir/Allan M. Williams, 1993, S.33.

② 参见 Henz Kramer, 1988, S.107ff., 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大城市的紧急状态被取消。到1987年,“只不过”(lediglich)是在东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恐怖主义控制下的地方继续实行紧急状态。

③ Meltem Müftüler Bac, 2001, S.141

④ 参见 Ahmet Evin in Ahmet Evin/Geoffrey Denton, 1990, S.11.

⑤ 参见 Atila Eralp in Canan Balkir/Allan M. Williams, 1993, S.33.

⑥ 参见 Atila Eralp in Canan Balkir/Allan M. Williams, 1993, S.33.

⑦ 参见 Bulletin der EG 9-1988, Ziffer 2.2.20.

⑧ 参见 Bulletin der EG 6-1980, Ziffer 1.4.1 bis 1.4.7.

洲货币单位的无需偿还的经济援助,向健康计划^[1]提供了最高 150 万欧洲货币单位的无需偿还的经济援助。其他的经济援助也随之而来。^[2]

欧洲委员会强调了它的意见:土耳其“适合”(geëignet)作为欧共体的成员,双边关系应在合作协定的框架内继续向前发展,当然必须面对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不断增长的义务使土耳其加入欧共体变得非常困难。1993 年 1 月 1 日,酝酿已久的欧共体内部市场启动,欧共体在短时间内不会进行新的入盟谈判。

欧共体的拒绝让土耳其政府感到非常失望,它希望至少在 1992 年能够开始加入欧共体的谈判。土耳其没有气馁。土耳其政府采用了一种比较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声称土耳其赞赏欧共体对它具备成员国能力的认可,加入欧共体是土耳其继续追求的目标。^[3]

从 1983 年开始,土耳其逐步向民主的方向发展。土耳其在 1987、1989、1991、1995、1999 和 2002 年都举行了议会选举,这些选举把民主和自由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4] 1991 年 10 月 20 日的选举可以被视为巩固土耳其民主的典型例子,经过这次选举,自 1983 年以来一直执政的祖国党成了在野党。政府的更迭——不再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那样的街头斗争和恐怖手段——再也没有那些问题了。更多见的是,从 1991 年到 1999 年,不同的党派由于在选举中没有达到必要的多数,不得不与别的党派进行联合,这些党派能够为了政府的工作需要而进行合作。

1989 年 1 月,新组成的混合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5]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删除土耳其刑法中的第 141、142 和 163 条,取消对土耳其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并以此来适应《欧洲人权公约》。^[6] 那些条款将会使土耳其被排斥在欧洲理事会之外。土耳其终于在 1991 年废除了那些条款。1991 年 7 月,土耳其释放了大批政治犯。这些举措再次显示了土耳其进行国家民主化改革,并以此加入欧洲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

1991 年,土耳其成立了专门的部,该部的工作就是按照欧共体的要求来保障人权,并与欧共体的标准相适应。由右翼党派和社会民主人民党(Sozialdemokratische Volkspartei)组成的联合政府在 11 月 14 日制定了“民主化方案”(Demokratisierungspaket),根据该方案将对土耳其刑法进行全面修订,修订后的新刑法将向欧共体的标准靠拢。欧共体评价这是土耳其政

府继续坚定推行民主化的表现。

关税同盟

1991~1995 年是土耳其走向关税同盟的标志性时期。关税同盟必须符合由欧洲议会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土耳其与欧共体进行关税同盟的谈判受到欧洲议会的压力,缔结关税同盟条约依赖于土耳其国内的人权状况。为了达到欧洲的人权标准,土耳其做出了巨大努力,目的是到 1995 年底关税同盟的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1995 年 7 月 23 日,土耳其大国民会议修改了宪法第 16 条——从 1995 年 10 月 28 日起,土耳其《反恐怖法》第 8 款将被用于维护土耳其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主义,而这在事实上限制了意见表达自由,故要重新进行审查。这次宪法修订使得 70 名政治犯被释放。新的《反恐怖法》第 8 章降低了监禁期限,对进行恐怖主义宣传的罪犯的惩罚从监禁 5 年改为监禁 3 年。欧洲理事会赞扬了这次宪法改革,称土耳其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了民主。^[7]

1995 年 12 月 13 日,^[8]欧洲议会以 343 票赞成、149 票反对、36 票弃权的多数通过决议,决定在 1996 年 1 月 1 日以后,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一项关税同盟条约。这个投票结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关税同盟本身:它决定了土耳其和欧盟的政治联系,同时也鼓励了土耳其国内进行的经济改革。

与关税同盟条约一起被欧洲议会通过的还有一项关于土耳其国内人权状况的决议。这项决议敦促土耳其“继续进行必要的宪法改革和刑法改革,以确保人权

[1] 参见 *Bulletin der EG* 11 - 1987, Ziffer 2.2.20 到 1988 年 11 月,“土耳其特别行动”最后部分的援助达到了 1 900 万欧洲货币单位。

[2] 参见 *Bulletin der EG* 12 - 1987, Ziffer 2.2.23。

[3] 参见 John Redmond, 1992, S.49。

[4] 参见 Meltem Müftüler Bac, 2001, S.143f。

[5] 参见 *Bulletin der EG* 1 - 1989, Ziffer 2.2.13。

[6] 参见 Meltem Müftüler Bac, 2001, S.147f。

[7] 对此可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Dossier Customs Union Turkey: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Democracy in Turkey*, Brüssel, November 1995; 还可参见 Beschluss Nr. 3/95 des Assoziationsrates EG - Türkei vom 24. Juli 1995 (95/318/EG)。

[8] 欧盟与土耳其建立关税同盟的决定可参见 *Bulletin der EU* 12 - 1995, Ziffer 1.4.67 und ABl. Der EG C 17 vom 22.01.1996。

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和民主化改革的不断向前发展”。^①如果改革的步伐停止,欧盟将冻结当年的财政援助项目,这就使欧盟继续对土耳其保持着压力。

1996年9月19日,欧洲议会将“停止向土耳其提供援助以对其施加压力”作为一项决议予以通过。有了这项决议,土耳其就必须严肃对待,并不断努力去改善人权。

后赫尔辛基时期 (Die Post – Helsinki – Phase)

1999年以后,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出现了重大改善,这直接与土耳其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减少有关,而恐怖主义则是土耳其最害怕的。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在肯尼亚的希腊大使馆被逮捕;1999年6月,通过独立的司法程序,大范围的分裂主义恐怖活动被遏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才得以快速向前推进。

1999年12月,欧洲理事会在赫尔辛基接受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成员国,并在此基础上将土耳其与其他候选国一起纳入欧盟的扩大战略。欧盟在赫尔辛基标准中为土耳其入盟制定了短期(在一年内完成)和中期任务。土耳其要在制定它的国家计划时确定完成这些任务的时间表。

在后赫尔辛基时期土耳其必须加快政治改革。2000年7月,土耳其政府通过了德米罗克报告(Demirok – Bericht),报告包含了为适应欧盟标准而必须进行的政治改革。土耳其政府在这份报告的建议下开始了改革进程:1999年12月修订了公务员法;1999年6月22日修订了国家安全法的第143条,并将军事审判员用民事审判员来代替;1999年11月对刑法第243条和第245条进行修订,虐待被捕者将受到更高的惩罚,并且对逮捕权进行了限制;从1998年到2000年,土耳其大国民会议的人权委员会制定了一项针对警察和审讯技术情况的新的计划。^②

从1998年开始,欧盟人权委员会每年都会出具一份关于入盟申请国取得进步情况的报告。在涉及土耳其的报告中都要包括这样的内容:解释民主秩序的根本特点以及土耳其与哥本哈根标准还存在的差距。在欧盟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土耳其每次都被要求继续

迅速地取得进步:解决人权领域存在的问题;保护少数民族;采取措施制止刑讯逼供;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认真考虑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认真考虑土耳其军队的影响。

协调与改革

作为对欧盟批评的回应和向赫尔辛基政治标准的努力,从2001年秋开始,土耳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协调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土耳其的立法将大规模地向欧洲标准靠拢,从而使土耳其法律与欧盟法律接轨。

2001年10月,^③由民主阵线党、祖国党和民族行动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制定了第一份协调方案,修订了1982年宪法的第34条,这份方案在2002年2月6日的土耳其议会上通过。通过这份“小民主方案”(Mini – Demokratie – Paket),土耳其把欧盟为入盟申请国制定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标准与《欧洲人权公约》协调起来。关于土耳其刑法第159条和第312条的修订则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第二份协调方案于2001年10月由政府制定,在2002年3月15日被议会通过,关于出版、政党、结社、集会和示威的法律都经过修订向欧盟法律靠拢。这些改革都在短期内按照国家计划完成。

2002年1月,土耳其大国民会议对民法做了重大修订,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在1030条附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关于男子作为家长的规定;男性和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都提高到18岁(以前男性是17岁,女性是15岁);非婚生子女和其他子女具有相同的继承权;允许被收养的孩子受到父母亲中一方的单独教育。^④

第三份协调方案在2002年8月3日由土耳其议会通过,土耳其进一步满足了欧盟的要求。这份方案最重要的内容是取消死刑,实际上已经停止执行20年,但是在战争期间和直接由战争造成的情况例外,这也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公约的第六号议定书相符合。此外还进一步扩大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① 参见 *Bulletin der EU* 12 – 1995, Ziffer 1.4.70 und ABl. der EG C 17 vom 22.01.1996。

② Meltem Müftüler Bac, 2001, S.155。

③ 关于协调方案中设想的一种非常好的宪法可参见: <http://www.tcberlinbe.de/de/archiv/2003/Inoffizielle%20Zusammenfassung.pdf>。

④ 参见: „Turkish Women Rejoice,“ in *Horizons*, 15(2002)3, S.8ff..

修订了集会法和捐赠法,允许公民在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允许在私人学校的教学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

2002年12月3日通过的第四份协调方案改善了警察拘留条件,禁止酷刑和虐待,允许自由结社,少数民族获得不动产捐赠的手续也将变得简单。此外还限制了取缔政党,取消了多种政治禁忌。

第五份协调方案在2002年12月9日由议会通过,它与欧盟法律接轨,使得欧洲法院在其职权范围内重新受理人权方面的诉讼变得更加容易。

2002年12月,欧洲理事会在哥本哈根做出决定:2004年12月,欧盟将根据对土耳其基本情况的评估报告,决定是否与其展开入盟谈判。如果土耳其愿意,谈判则可以顺利地开始。欧盟虽然没有全面阐述对土耳其正义与进步党新政府(neue Regierung der Gerechtigkeits- und Fortschrittspartei)的期望,但也明确地表示,土耳其必须达到其他尚未达到的政治标准,并且对其他重要法律进行修订。

为了扩大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2003年6月12日的第六份协调方案将《反恐怖法》的第8条取消了。此外还规定,土耳其的私人 and 官方电视台及广播电台可以使用官方语言或者方言进行转播,土耳其公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官方语言或者方言。土耳其还进一步扩大了宗教自由,向不同的宗教开放了传教场所,允许人们信仰自由。这份方案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土耳其刑法的第462条,从而使得降低对“由于通奸和非法性行为引起的感情冲动的谋杀”犯罪的惩罚成为可能。土耳其的这些措施又向欧盟的标准前进了一步。

2003年7月23日通过的第七份协调方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常受到欧盟批评的职责和功能做了修改,这个机构开始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此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进一步扩大,儿童的权利得到保护。在个人自由、安全以及禁止酷刑和虐待行为作为“占优先地位的”(vorrangig)事项进行调查,不得迟延,并且最多在30日内做出处理。

2004年5月4日通过的第八份协调方案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取消国家安全法庭,同时不再委托刑事陪审法庭审理恐怖主义案件。^①

2004年6月24日通过的第九份——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份协调方案,终于彻底废除了死刑(也就是说

包括战争时期),扩大了出版自由。此外,还将高校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委员会中的军事官员由文官代替,从而按照欧盟的要求进一步降低了军队的影响。

结论

土耳其对宪法的修订和协调方案的制定表现了它对欧盟的要求和批评的积极回应。批评和指责无疑暗示了欧盟对土耳其国内政治困难的深深的忧虑,同时也反映了欧盟对伙伴国家的政治发展在按照自己的标准做出评判。^②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土耳其如果真的想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它就必须按照欧盟的最高标准来衡量自己,这自然也就是对民主的要求。因为对于欧盟来说,民主是一体化的基本条件。^③今天的土耳其已经是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国家了。欧盟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难想像,如果没有加入欧盟这个目标的持续鼓励,今天的土耳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还是一个什么状况。

2004年12月,欧盟将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能够与土耳其展开入盟谈判。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还在继续向前推进,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土耳其终于公开宣布,哥本哈根标准就是“安卡拉标准”(Ankara Kriterien),它必须将这个标准内部化并逐步实现。欧洲的同一性是通过价值而不是伦理或者宗教来确定的,这种价值包含了民主、法治国家和人权。土耳其在努力实现欧洲的标准,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也不应该忘了它的抉择。实现土耳其民主和法治的最终办法不在欧盟手上,人们希望,土耳其应该知道这是它自己的责任。

(人民出版社 刘可扬译)

[收稿日期:2004-12-09]

[修回日期:2005-01-05]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Milliyet* vom 5. Mai 2004

② 参见 Ahment Evin in Ahmet Evin/Geoffrey Denton, 1990, S.11

③ 参见 Atilla Eralp in Canan Balkir/Allan M. Williams, 1993, S.32

concrete form, route, and mechanism for political economy inter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se theories are worth serious study and refer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Zhu Tianbiao(44)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 are two relatively new Western academic fields that arose in the late 1970s. While IPE has already fully developed, CPE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By offering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fields in the West,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clarif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ield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two term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that mark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IPE and CPE.

Legitimacy and the Decline of Hegemony

Zhou Piqui(5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rst, it criticizes current theories on the collapse of hegemon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ecline of material strength and the waning of domin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the reasons for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assumption of state reason and the cause for the downfall. The decline of hegemony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war. Based on this criticism, the paper revises the reasons for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pointing out the real reason is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hegemony. The logical process in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is: legitimacy crisis, maintenance of hegemony by way of power, increases in the costs of maintaining the hegemony, exhaustion of power, and downfall of hegemony. Therefore, a countermeasure to stop the downfall of hegemony is to make the utmost effort to maintain its legitimacy.

The Influence of the EU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Turkey

[Turkey] **Zuhal Yesilyurt Gündüz**(56)

Turkey is a special European country in that both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have played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s. Turkey has been striving for many years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has undertaken reforms based on EU standards. The EU has proposed very strict and even harsh requirements. The major requirement is the demand that Turkey eliminates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troops in national political life and realize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rule of law, including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freedom of speech, the lifting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prohibitions against abuse and torture, among oth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Turke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reaching close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EU, and it is still increasing its reform steps. Despite the many obstacles to joining the EU, whether Turkey will eventually be successful mainly depends on Turkey itself.

A Study of the Path to Rationaliz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Problem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ir Resolution

Zhang Haidong Zhu Zhongdi(63)

With the increasingly extensive use of technical barri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rational use and cutting down and eliminating unjustified restrictive trade factors, namely, achiev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on the current agenda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cept and path to rationalize the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he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choices of future paths for rationalization. He suggest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resolution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rationalizing two - tier market access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Shen Hongfang(69)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chiev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mid - 1980s to 1997. The IMF and World Bank have attributed the 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miracle” to the successful regional applications of neo - liberal theory and new macroeconomic theory as well as to the liberalization, deregulation, and privatization reforms implemented by the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to comply with the trend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he IMF and World Bank regarded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 “models” for imitation by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the sudden eruption of the unprecedented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roused doubts about whether the benefi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an be equally shared by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crisis, the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began to dialectically re - evaluate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ed mainly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devis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hat can best serve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ests.

Review of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History, Reform,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Ren Jingjing(75)